



# 武术传播研究的“十三五”进展及“十四五”走向 The Research of Wushu Communication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and Its Trend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刘韬光,李守培\*

LIU Taoguang, LI Shoupei\*

**摘要:**对武术传播的“十三五”进展及“十四五”走向展开研究,认为:1)多学科理论与视角的融入拓宽了武术传播研究的视野;2)武术影视及“互联网+”相关问题成为武术传播研究的热点;3)与新时代背景及国家发展战略的融合成为武术传播研究的趋势;4)武术传播海外实证及中外比较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取得新突破;5)以历史梳理为背景并获取新知成为武术传播研究的自觉,构成了武术传播研究“十三五”进展的主要方面。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武术传播研究“十四五”走向的学理依据,并将其走向研判为:1)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武术传播研究服务国家系列重大战略的能力;2)更多融入相关学科视角与理论,拓宽研究视野、强化理论支撑,同时注意不同视角与理论的互相融通与支撑;3)强化个案研究,深入反思具体现象与宏观问题之间的互动,凸显研究的具体理论价值与现实实践意义;4)在着重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定量研究,以定性引导定量,以定量支撑定性,使研究的价值更高、内容更实;5)进一步强化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更多关注武术传播的域外实践及比较研究,在更大时空范围内透视武术传播等问题。

**关键词:** 武术传播;进展;走向;“十三五”;“十四五”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trend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suggests: 1)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theory and perspective broadens the research field of Wushu communication; 2) the related issues of Wushu film and internet plus become the focus of Wushu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the new era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trend of Wushu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Wushu's overseas experience and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 have made new breakthroughs; 5) taking history combing as the background and acquiring new knowledge becomes the consciousness of Wushu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hich constitutes the main aspect of the new progress of Wushu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On this basis, it further puts forward the academic basis of the trend of Wushu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considers its trend as follows: 1) Improve the political position, and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Wushu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o serve the national series of major strategies; 2) integrate more perspectives and theories of related disciplines, and broade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mutual accommodation and support of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theories; 3) strengthen case study, and reflect on the interaction and connection between specific phenomena and macro issues, and highlight the specific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4) strengthen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focusing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to guide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support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make the research more valuable and practical; 5) further strengthen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e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Wushu communic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perspective the problems of Wushu communication in a larger space-time range.

**Keywords:** *Wushu communication; progress; trend; the 13th Five-Year Pla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识码:** A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2017ETY002)

**第一作者简介:**

刘韬光(1988-),男,讲师,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武术文化与传播,E-mail:luohan909@126.com。

**\*通信作者简介:**

李守培(1985-),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武术哲学、历史、传播,E-mail:lishoupei@126.com。

**作者单位:**

上海体育学院,上海 200438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武术传播研究历程以中国社会发展大势为历史前提,并与之所处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导向密切相关。回顾已有武术综述性研究,大都基于新中国成立或改革开放等历史节点展开,鲜见聚焦更能体现时代脉搏的五年规划周期的研究。“十三五”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将中国武术写入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使之进一步与文化联合、与健康联手、与教育联动、与产业联姻,综合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中国武术发展的战略思考和基本思路。这一局面的开创离不开武术传播行为、活动的有序开展,也离不开武术传播研究实践解释力和理论预见力的有益支撑。由此,立足“十三五”、前瞻“十四五”时期着眼于武术传播研究进展和走向是本研究主旨。

## 1 武术传播研究“十三五”新进展

### 1.1 多学科理论与视角的融入拓宽了武术传播研究的视野

自“十二五”时期,武术传播研究便已在相关学科理论的融合与借鉴中形成有益成果和观点。如《民族体育跨文化融合》采借多种理论进行相关问题阐释,其中涉及水溶性文化融合理论,认为包括武术在内的民族体育可通过城镇化、城市化以及竞技化(陈青,2010)等途径实现全球化传播与共享。“十三五”期间,武术传播研究在多学科理论与视角的融入中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在理论借鉴方面,相关成果以传播学基本理论知识为主干,进一步融入与之密切关联的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如“第三空间”理论(孙刚等,2018)、品牌学理论(李臣等,2018)、文化传播学理论(温搏等,2018)、文化地理学理论(吕旭涛等,2016)、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陈威,2016)等均在武术传播研究中有所运用。其中,有研究基于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拟剧理论指出武术的存在符号并不等同于其本身,受众常因混同武术能指与所指而产生两个极端认识(侯胜川,2020),该研究在理论选择与观点上较具代表性,且作为典型的非语言性身体符号的武术传播研究亟待成为主要研究论域。还有研究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出发,深度探讨了文旅融合背景下金庸武侠地理学的价值与开发策略,既为武术传播研究提供了“武侠地理学”的新概念(卢敦基等,2020),也为其传播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此外,标准化理论的运用相对集中,相关成果对武术传播过程中的术语标准化命名原则(刘韬光等,2016)、武术技术标准化(范铜钢等,2016a)、与奥运会同类项目技术标准化水平(范铜钢等,2016b),以及武术与中医标准化发展(李守培等,2018,2019)等进行思考并获以有益启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中国武术发展五年规划(2016—2020年)》“推进标准化建设”的总体要求。

自“十二五”时期武术传播研究兴起以来,学者们立足不同视角表达各自观点,“十三五”期间延续了这一态

势,主要聚焦于以文化为基干的多维视角审视武术在国际层面的传播,融入了文化史(戴国斌,2016b)、文化选择(满现维等,2016)、文化安全(王建伟,2017)、跨文化教育(孙刚等,2017)、文化工具论(刘文武等,2016)等视角,并据此对武术传播思路、理念、路径进行探讨。从研究内容方面,上述成果均以武术的文化蕴含为事实前提,以其国际传播效度为研究进路,从而借助文化相关视角在整体上予以分析和建议。武术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因素与考量日益成为学界共同关切并致力于由此阐发新观点、揭示新规律的研究领域。这与“十三五”期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价值取向具有或隐或彰的关联。还有研究立足假晶现象(王东旭等,2016)、“借势”体系(肖留根,2017)等独特角度,对武术不同形式、内容、层面的传播发展及推广进行阐述。

### 1.2 武术影视及“互联网+”相关问题成为武术传播研究的热点

“十三五”期间,在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有益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各种文化形态受到广泛关注,作为中国特有类型——武术影视,成为武术传播领域的研究热点,相关成果不仅刊录于体育学期刊,也发表于传播学、电影学等专业期刊和综合性大学学报,呈现出跨界研究趋势。如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出现了以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为研究对象的电视、电影传播研究(郭玉成,2016)。相关研究对于武术影视“既能体现中华文化与时代精神,也因其技术、功能、英雄的奇观化而产生文化误读”(李义杰,2016)的辩证认识较此前时期有所深化,并通过武术影视历史变迁(李牧等,2016)、类型演变(贾磊磊,2017)、当代精神(周莎,2016)、价值观嬗变(黎煜,2017)、传播标准(李守培等,2016)等的考察与洞悉,以更为理性的态度进行审视和省思。如徐浩峰通过与形意拳大师李仲轩等民间武术人的相处问道,以坚守有源、有型、有力的内容创作(李凡,2016),肆力真实武术历史文化意蕴的回归。袁和平等(2016)希冀武术影视要“把我们中国那种侠义的人文思想,尤其是练武之人的武德带给西方人看”,不论武术影视学界还是行业,均体现出武术文化的鲜明自觉。

“互联网+”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十三五”期间被列入国家多项事业发展五年规划。在此背景下,学者们结合武术传播与“互联网+”相关问题展开积极探讨,主要涉及传播理念、方式、路径等方面:1)传播理念,应以“网络文化强国”战略为引领,由线下传播向线上传播转型,整合域外新媒体,强化实质性意义的双向交流合作(李臣等,2017);2)传播方式,可将“互联网+”与武术健身防身、竞技武术、表演武术、休闲娱乐武术(杨少雄等,2016)等融合共建,打造数字化传播消费技术体系(郭巍等,2018);3)传播路径,通过知识产权应用,以数字化手段建立武术培训与研究基地创意平台(丁传伟等,2016),

并以新型媒体技术为媒介进行实时跟踪和及时反馈(孙超,2017)。在决策咨询与政策制定方面,《武术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5年)》中关于“互联网+武术”的规划内容凝聚着武术传播研究者的智慧。目前,“互联网+武术”模式更多应用于武术的学、练、赛、演等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大力推广居家科学健身方法的通知》,大量武术功法学练视频得到广泛推介,通过“互联网+”跨空间连接功能,将生活、工作、学习与健身融为一体(孙科等,2020)。但武术作为一项复杂且精细的专门性技术和身体行为,在以居住空间为主要场域的传播过程中,其内容合理性、负荷科学性、锻炼实效性传播效果尚待进一步探索和验证。

### 1.3 与新时代背景及国家发展战略的融合成为武术传播研究的趋势

新时代背景及国家战略作为驱动中国发展实践的强大引擎,为各学科领域贡献了理论支撑和学科智慧,如“十三五”期间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理论命题开展的武术传播研究,获批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体现出学者们对时代前沿的积极把握。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在深入新时代背景和国家战略的思考中,围绕武术传播如何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中国梦”实现、推进民族复兴征程、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实现自身新发展,产出大量学术成果,主要聚焦如下方面。

1)置身新时代背景,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武术传播发展的整体思路,有研究重点阐释了其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主体性(黎桂华等,2019),也有研究强调要坚守文化自信的立场(董川等,2019),并据此提出新的传播构想;2)立足“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董刚等,2019;陆小黑等,2020;吕韶钧,2016)议题及相关实施路径、推广策略受学界热议,并由此引申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广泛探讨;3)从“中国梦”视域,一方面以国家主体需求重新审视了武术传播发展战略(杨建营,2018),另一方面也关注传统武术在“中国梦”实现征程中的责任担当(周维方,2019);4)基于民族复兴进程,既提出了武术文化传统复兴与重建(龚茂富,2018a)的思想,也探讨了传统武术的信仰危机与文化重生问题(方国清等,2019),为中国武术的传播道路以及内在意蕴提供了思考空间;5)着眼于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主要论述了武术传播的特有价值(陆小黑等,2018a),也指出了武术文化软实力研究之正途(陆小黑等,2018b)。

回溯“十三五”时期,中华武术之所以屡被写入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学者的不辍阐发,使其社会、文化、体育、教育、健康等功能价值不断深化,为国家重新洞见武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健康方面,旨在改善身体机能、提升生命质量的武术与健康促进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权威肯定,其

代表性成果“Tai Chi and postural st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刊载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武术现代健身价值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进一步激发了相关职能部门、研究学者的自觉意识,不仅倡议发起了诸如“共享太极 共享健康”万人同练太极等全民健身活动,也基于普及与推广的基础性、大众性、公益性意指(张银行等,2013),形成了《中国武术实施健康传播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思路》《关于“后奥运”武术普及与推广的若干思考——基于国内的视域》《太极拳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支撑与路径研究》等学术成果,为研究制定和推进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供了有益借鉴。综合而言,“十三五”期间由于各项国家战略的高度协同发展,使这些研究成果在整体上呈现出既交叉又独立的情状。一方面,彰显出国家意志和政策的强大导向性和号召力,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及社会各界需要高质量成果以指导武术传播实践的迫切理论诉求。另一方面,将武术传播研究与时代背景和国家战略相结合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武术传播研究进展是以国家发展大势为前提的客观规律。

### 1.4 武术传播海外实证及中外比较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取得新突破

“十三五”期间,武术传播海外实证研究进展可归结为3方面:1)所考察区域范围较以往有所扩大,并相应总结了武术海外传播所面临的共性问题。综合两者来看,有研究指出,传播方式、途径、内容、人群等的单一化是制约武术在意大利(李艳君等,2017)、克罗地亚(徐卫伟等,2018)传播推广的主要问题。在对美国(胡凯等,2017)、冰岛、挪威、喀麦隆(韩晓明等,2018)4国孔子学院的武术传播调查中,除上述相似问题,还存在资料匮乏、人才缺乏、认知不足等困境。有研究针对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匹兹堡、亚特兰大、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等8个城市调查指出,武术传播在整体上仍处于零散无序状态,且大部分民众对武术认知层次较浅(吴文峰等,2017);2)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方面有一定的新收获。有学者采用海外民族志研究方法,调查了美国康村的武术开展状况,既揭示了武术海外传播所面临的文化间性问题(龚茂富,2018b),也对有效运用民族志方法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对美国和英国的太极拳传播调查中,前者基于大型语料库BYE-COCA平台,探讨了太极拳在美国大众媒体中的呈现形式与内容(杨素香,2017),后者通过实地调研,结合翔实的代表性传播者信息和图文素材,系统梳理了太极拳在英国的发展历程与传播动力(马秀杰等,2020);3)在研究对象选取方面有所创获,有研究通过来自95个国家留学生的1638份有效问卷展开武术传播模式研究(周庆杰,2016),其对象虽是来华留学生,但反映出武术海外传播情状,且如此大规模的样本量在该领域并不多见。《中国武术与国家形象》通过347份问卷对来

自五大洲的外国习武者展开对包括中国、中国人、中国武术和中国习武人群在内的形象认知调查,为武术构建国家形象提供了参照与依据(郭玉成等,2015)。还有研究以北美网络翻译平台“武侠世界”为例,探讨了网络文学中武术文化的译介与传播问题(刘毅等,2018)。2018年在英国卡迪夫大学召开的“李小龙文化遗产国际学术会议”上,形成了“李小龙的传播学”主题(马秀杰等,2018),拓宽了武术传播研究视野。此外,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形成的部分专著中亦涉及武术海外传播的相关数据、素材或史料。

在中外武技传播比较方面,自“十二五”时期围绕中日武技涌现出大量成果。《从术至道——近现代日本武术发展轨迹》指出,日本武道“修行礼仪、磨练技艺、锻炼身体、铸造魂魄”的人格培养原则尤值武术传播发展借鉴(郑旭旭等,2011)。“十三五”时期,相关成果亦主要集中在中日两国。有研究认为,日本武道与中国武术向海外传播的效应存在着时间差,前者先于后者30年(潘冬等,2016),或也因此优先形成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并经过对柔道、空手道(王宇新等,2017)、相扑传播实践经验的归纳概括,得出对武术传播的有益启示,其中强调要充分释放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的武术对心理、人格、品格的塑造作用(阎彬,2018)。还有研究通过比较韩国跆拳道与中国武术发展,总结了影响武术国际化发展进程的因素及启示(崔怀猛等,2018;段天龙等,2017)。在中西武技比较方面,有研究指出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内倾化的价值诉求、艺术化的表达方式,是中国武术区别于西方武技的本质特征(王明建等,2017),更为内在地揭示了中外武技在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差异性。

### 1.5 以历史梳理为背景并获取新知成为武术传播研究的自觉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的深刻意蕴在“十三五”期间得到不断阐发。在武术传播领域,对历史的梳理获取新知成为该时期武术传播研究的历史自觉,并认为应进一步深入到“传播什么、谁去传播、怎么传播”的最本质追问中,以引出新思,发出新知。这一本质追问,须纵深到历史当中,以一种向古的维度补足和拓展武术传播研究的历史面相,开掘和转化传统传播思想(陈卫星,2019)。纵览相关成果,主要围绕宋元明清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武术传播历史展开。

明清时期的武术传播发展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如马明达(2007)著《说剑从稿》中包含明清时期武术相关人物、器械、拳种、流派、制度、史实等的考证,为佐证、爬梳武术传播史实提供了翔实素材。“十三五”时期,相关成果在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的选取实现创新。有研究着重基于宋元明清时期城市史的考察,提出古代城市的大发展推动了武术的传播与繁荣,并认为城市场域内的议题应当成为当今和未来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域(张震等,

2020)。也有研究指出,明清以迄近代一以贯之的“向实”思想,孕生了尚力尚武以振奋民气、强种救国思潮的转化、实践与传播(张银行等,2019),揭示了武术对于国民体力的塑造作用,对于国力国运昌盛具有实在性价值;以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视角,考察了海峡两岸在元之前及明清时期的武术交流史,以透过对两岸武术文化认同衍变根源的深入剖析,树立正确的中国武术史观(张银行,2018)。还有研究以武术传播话语权危机为研究缘起,以媒介记忆理论梳理了明清以来传统武术话语权的历史钩沉,并从传者、受众、媒介方面提出应对之策(刘宏亮等,2018)。由此,宋元明清作为武术逐步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是创新武术传播研究的重要学术空间。在其他方面,有研究梳理了先秦至今武侠精神的历史演变(陆小黑等,2016),其学术传播、文化传播、历史传播在新时代具有重要意义(郭玉成,2019),还有研究专门考察了民国时期的武术传播史。

纵览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来的武术传播历史研究,主要聚焦于以口述历史为方法而产生的系列成果,一方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术的国际化发展(陈新萌等,2018)、对外交流历程(郭发明等,2018)、武术锻炼者、武术知青、武术教改师生、外国人的集体记忆(戴国斌,2016a),进行了民间武术馆校传播实践考察(侯胜川,2017),提出了诸如社会普及与精英传承、传播并行的模式(周维方等,2018);另一方面通过武术专家系列访谈录(郭玉成等,2018a,2018b;阴晓林等,2018;张路平等,2018)中受访者的个人发展史,关联起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来的武术传播史,为新中国武术史研究提供了宝贵史料,也初步构建了武术家口述史研究范式。“十三五”期间迎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此形成了《新中国武术70年发展历程解读及当代思考》等成果。还有研究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术传播史实的再审视(唐韶军等,2018),为当代武术传播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 2 武术传播研究“十四五”走向的学理依据

### 2.1 “十三五”期间武术传播研究不足

“十三五”时期武术传播研究立说在整体上取得较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较为突出的是多以宏观、定性研究居多,微观、定量研究相对匮乏,因而整体呈现出“重宏大叙事,轻微观阐释”“重理论,轻实践”“重描述,轻深入”的特征。

1)传播发展需要价值扬颂和宏大视野作为高屋建瓴的指向。当下,内嵌中国叙事、赋力国际发展的武术传播研究的吸引力和塑造力不断增强,务实聚焦于宏观与微观研究间的“引领与融合”“互动与支撑”显得必要且重要。如李小龙在海外认知度极高,但域外民众对当代武术的认知不足,其中原因或是其对武术的认识依然侧重

于一种“打”的武技,与国内学界所致力于阐释的文化高度尚有一定距离,亟待武术传播研究明察细究,以调适优化传播策略;2)武术传播理论研究虽受到学者重视,但仍需进一步关照理论抽象和深化,以提升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来向武,2013),与此同时在研究内容中应适当融入、结合定量或实证研究成分,以客观实际验证已有理论,推进其科学把握与运用。如作为一种双向社会互动行为的武术传播,长期以来的理论研究多偏重于“传者”一方,关于“受者”一方的研究尤为匮乏。由此,相关理论成果亟待以客观事实予以检验与修正,以更科学地进行理论抽象与深化;3)武术传播在不同时空中的发展历程描述,以及与此相关的一般性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固然基本且重要,但进一步深思隐含其中的传播本质问题,或为武术传播研究的题中之意,也可据此拓出新的学术空间。截至2020年7月,全球有162个国家(地区)设立了54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武术作为选修课开设,从受众出发,以更为本质的“为何练,练什么,如何练”为逻辑进路逐步拓展至武术传播各个环节的思考,有益于切实揭示和把握武术传播属性与规律;4)目前的研究并未切中人体文化传播学的核心,亦缺乏对武术的身体行为持续而明确的学术聚焦。作为以身体为依托的武术文化传播行为和活动,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活媒体,自有在传播上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但目前大多研究偏于其中一隅,有待形成系统、周全的传播战略。如在我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的新时期,武术理应设计一套以文明共享为原则,以生活方式为基础,以器物文化为支撑,以精神文化为核心的全球化推广文化战略(陈青,2009)。

## 2.2 武术传播研究身处时代背景的转换

“十五”期间武术传播主要着眼于国际化发展,“十一五”期间武术传播的诉求相对集中于成为北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十二五”期间武术传播的趋向在于融入并普及全民健身运动和扩大国际影响,在“十三五”期间,武术传播的愿景目标已更为突出地体现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塑造好中国形象”的重要职责。显然,不同的时代背景推进着武术传播主题的转向与调适。由此,面向“十四五”时期,武术传播在此新征程中既会面临新挑战、新机遇,也会迎来新的研究可能和学术生长点:1)时代背景的转换必然催生新的理论资源。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会为武术传播提供新的理论阐释依据;2)我国从“十五”到“十三五”的发展历程与国际局势走向密切关联,各历史时期武术传播研究的新观点、新焦点、新热点,无不形成于其所处国内和国际变局的时势中。“十四五”时期,在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的新互动下,武术传播研究定位也需随之重

新审视与调整;3)时代背景转换势必触发新的社会现实问题,与之相关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的介入,是产出武术传播研究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甚至影响其研究走向的重要客观因素和内在动力;4)当今时代人的主体性不断高扬,通过身体锻炼提高生命质量的意识日益高涨,符合并满足人类需求的文明共享和交往互惠更为深入持久。由此,发扬武术形塑身心、主客、内外中和的优势、传统,直面人类身体,凸显人本精神,是其亟待关切的传播依据。

## 2.3 武术传播研究自身需要和内在逻辑

武术与其他领域的关联融合、同频共振综合预示了“十四五”时期武术传播活动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与之相应也表征出武术传播研究的广阔学术空间。武术传播发展是以中国社会发展为其历史前提的。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已进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大势下引以深思,武术国内国际传播研究到了一个亟待进行拓展、深化、创新、变革的历史性节点,这也是包括武术传播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近年,武术传播实践在文化、教育、体育、健康等领域的作用与价值,不断逼显出其学术研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基于顺应时代步伐实现创新发展的考量,武术传播研究必须走向更加自由、灵活、切实的研究方向,加大力度探寻学科领域之间的交叉效应以及融合价值,在交融中把握前沿趋势、彰显时代意义(欧阳宏生等,2015),这或许是武术传播研究着眼未来、创新发展的重要面向之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让人类在疫情面前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疫情期间,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民族传统体育健身功法的抗疫、防疫作用,得到权威人士的积极肯定,进一步启示了武术与健康传播、公共卫生、体医融合等领域进行跨界合作的现实意义。“治学先治史”,历史中藏蕴着武术传播取之不尽的思想话题,以现有理论和框架深入挖掘、阐发中国古代武术“传”之经验,或其在传统文化、教育、体育意义上的“传”之问题,以历史中的智慧知识与理性思辨为基,进行分析地扬弃和综合地创造。如以身体为载体的武术,从伐人、娱人到完人的历史演进过程(陈青,2018),进一步深思其逐步迈向文明化的深层原因,提炼保障武术千百年来传播的基本特质,阐释其作为有益文化得以实现文明共享的学理根据和理论基础,应成为未来武术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积极选择,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思路。武术传播研究遵此进行主动建设,是武术行至千年、学科建立逾20年之后的必要自我觉醒。

## 2.4 以武术身体行为符号传播为研究支点

作为一种身体行为,武术必然要落实于人的身体、服

务于人的身体,这也是武术传播研究的基本倾向。包括武术在内的民族体育身体行为,是将原生的、随意的肢体活动凝练成具有一定指向性、专门化的系列技术动作体系,转化为具有人化能力的民族体育,并通过这种有序的、一定能量代谢的技术动作,完成对体能的不断提高和体质的不断增强,实现对人类生命塑造的目的(陈青等,2016b),明确指示了武术作为身体行为传播的效能——生命塑造。同时,作为一项经长期提炼而成的动态身体行为符号,武术具有强大的通约性,为其最大限度逾越文化、语言、信仰等因素,实现在人类社会的传播、交流、互动奠定了先决条件。因此,武术身体行为符号传播具有鲜明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武术身体行为符号融表意、传意、承意于一体,其传播既要充分提炼有益文明,且需恰契人类主体之“我”对客体之“身”的塑造价值(陈青,2008)。从武术由古至今的延传来看:1)武术自萌生至今,逐渐形成了集锻炼身体魄、淬炼意志、锤炼人性于一体的身体行为(技术)体系,其更合理且本质地与重视生命和身体价值的当代社会取向契合如一。为更好地将人类文明贡献武术所涵具的身体行为智慧,应进一步融入相关学科视角与理论知识,探究符合时代发展、迎合人类诉求的传播方式,扩宽更多身体“在场”的传播格局;2)作为一种伦理型文化的身体行为,武术倡导、追求并开辟了以人与人、天与人、身与心和谐关系为旨归(李守培,2016)的身体行为体系,以在此之中通向人本生命的自主自如。相关传播研究多为哲思型的理论阐释或理念性的解读宣介,缺乏基于现实的考察分析,故而需要加强和结合个案研究与定量研究,使之趋向直观简明的现代表达,以打造凝聚广泛认同且焕发修身意义的文化符号,探索借助各类媒介的延伸传播;3)行为始于观念,武术行为反映着中国人对待身体的观念。相较于西方体育之于身体的工具性,武术更突出表现出其作为生活方式的惯性,即一种融铸到生活之中的“拳不离手”的日常化行为体现。因此,武术的全球化共享需要加大域外实践和比较研究来认清传播现实、把握受众认知、汲取优良经验,推进其更为通俗的、日用的、切身的传播渗透。基于上述3方面,有学者概括为以养生文明、伦理文明、器具文明的鲜明观点(陈青等,2016a),从更高层面为武术身体行为符号传播的文明解读与内容提炼奠定了学理基础。

符号是文化创造与传承的媒介,以武术身体行为符号传播为支点,直指武术存在的基础——身体,构架新时期武术传播研究的致思方向,其不仅关照传者通过身体表达民族意识、传递民族智慧、承扬民族文化的国家意志,亦助于受者切身感召于武术生命塑造的有益文明。

在整体把握已有研究共性与趋向,兼顾相关问题聚类,审其时代背景,察其现实发展基础上,建立起专于武

术传播研究方向的认识与诠释的思考逻辑,为其施以具有学理性、理据性的布局谋篇,一方面是基于前述武术传播研究进展的宏观展开和具体把握,另一方面以期从纵横交错的理论、历史、实践中抽绎提炼客观的学理支持。

### 3 武术传播研究的“十四五”走向

3.1 提高政治站位,从“为谁传播、传播什么、怎么传播”的逻辑起点出发,强化武术传播研究服务国家系列重大战略的能力

“为谁传播、传播什么、怎么传播”关乎武术未来发展的逻辑起点。中国自古即有“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的深刻认识,加之“天下大同”的治世理想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情怀,武术身体行为的生命塑造对象顺乎情理,也合乎传统地指向了人类社会,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也高度符合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和积极参与全球化治理的精神原则。所以,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置身不同受众所处的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中开展武术传播研究,理应成为其在“十四五”时期的重要课题。

通过身体传承文化、延续文明已为人类所共识,这也为武术“传播什么”提供了根本遵循。1)武术文化是关乎人的生命塑造的文化,健康状况是人存在的根本,即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只有人类体质的不断完善,社会发展、文化进步、文明演进才成为可能并有其实际价值。因此,挖掘、提炼符合人类需求且益于身心合和的专门性技术内容和形式,依然是武术传播的重要内容;2)武术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蕴含,相关学者已对此进行细致阐发,武术传播研究应及时与之融合,并在积极借鉴哲学、文化学、历史学、传播学等领域的有关议题中,吸纳有益成分,提炼武术多样性形式和多重性内涵,着力树立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们共识的武术符号;3)相较于西方体育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文化品质,在“和合”思想以及“以道统技,以技臻道”观念影响下的武术,凝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理论与精神内核,其不仅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鲜明体现,亦是可供各国文化进行采借的文明成果。当然,武术内容的传播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需要明确传播区域,适当把握武术“技、理、道”不同层次内容的传播比重,循序渐进地进行传播渗透。

在“武术怎么传播”的研究中,关其形式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曾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由理论嫁接与附会生成的“模版”,仿照与套用其他文化项目得来的“再版”,依循国外同类项目复制的“翻版”。当下,“武术怎么传播”亟待进一步巩固并深化具有自身特色与优势的“母版”传播形式。相关研究或可从如下方面进行思考:1)除紧密结合方针政策中的宏大愿景与总体目标,更应切实于重在身体、重在日常、重在细节的传播探索,切入基于生活化、共享化、实用化的武术传播路径;2)探寻

以外交、文化、艺术、健康、体育、科研等手段谋求高层介入的官方传播渠道,以及充分整合民间优势拳种的传播经验,应用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传播理论与实践探索;3)人类需求已成为武术传播不容忽视的反向影响,满足需求的系统性、整体性、关联性的受众模式是武术传播的重要保障;4)在以受众的差异性区分基础上基于“互联网+”移动终端和大数据技术,进行精准化、靶向性传播探索,摸清不同受众用户的聚类需求。

### 3.2 更多融入相关学科视角与理论,拓宽研究视野、强化理论支撑,同时注意不同视角与理论的互相融通与支撑

传播是武术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武术传播问题是关乎其本质和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不论是着眼于武术与传播的密切关系,还是立足于千百年来武术传播这一社会现象,基于多元视角和理论去探讨、分析武术传播实践,已是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学术命题。从知识谱系角度,传播学广泛涉及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学科领域,以其理论学说为依附的分支学科已形成政治传播学、教育传播学、新闻传播学、艺术传播学等研究方向(张国良,2019),体现出传播学较强的融通力,也表征出武术传播这一身体行为实践活动的研究复杂性。作为以身体为载体的武术传播实践,其融健身、教化等功能于一体的技术体系及被赋予的多元符号意义,唯有“嵌入”人身与人心,才是切实实现了面向不同国家地区的持续深度传播,这也是包括武术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繁荣复兴的关键。因此,武术传播研究需要结合行为学、心理学、文化类型、需求类型等理论知识进行精准施策。

武术传播研究融入更多学科视角与理论,旨在多学科资源的参与和介入,以有效化解传播问题,达成传播目标。但也正基于此,武术传播研究仍需把握、处理好,其与所融入相关学科视角和理论之间的主次关系,以及互相融通与支撑问题:1)武术传播研究在与其他学科资源的融突和合中,不能使之喧宾夺主,随其亦步亦趋,而遮蔽武术传播的自身个性与特质,要在恪守鲜明的主体意识、理论性格基础上兼收并蓄,显现主见和创见;2)武术传播研究融合借鉴其他学科优势资源,不能是简单的学科点缀,而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解决、协调问题,形成实质性资源供给与智力支持(陆启威,2016);3)作为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武术的传播研究不可离开孕育其成长的传统文化根基与历史文化视角。由此,武术需要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以量化、直观、简明的方式为武术养生文明、伦理文明、器具文明的人类认知,奠定客观、科学的基础,以达成更理想有效的传播效果,亦为其进一步的深度传播创造良好条件。

当前,在学科融合日益成为学术研究协同创新发展主要途径的趋势下,武术传播研究进一步加大相关学科视角与理论的融入,既可以进一步促进其本身的理论建

设和创新,又可以切实地从不同视角对武术传播现实问题进行关照和镜鉴,这对于提升武术传播研究的纳新能力、自变能力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3.3 强化个案研究,深入反思具体现象与宏观问题之间的互动,凸显研究的具体理论价值与现实实践意义

在过去近100年的时间里,经由人类学、社会学的共同推动,个案研究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取向之一(卢晖临等,2007)。在武术传播领域,已有研究从“特殊和一般”“微观和宏观”等层面阐释武术传播现象,但在整体上倾重于后者,鲜见相关个案研究。例如武术身体行为的生命塑造包括人的精神境界的培养,而相较于开散的、纯理论性的阐释,针对到具体人或群体的个案考察更易于通俗的、感性的理解,便于受众接受与感知,达成文化体验;受关注较多的太极拳传播研究,是建立在对该拳种的整体把握上,具体到所属流派的针对性个案研究极少,但个案研究更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整体上,强化武术传播个案研究主要具有3方面价值:1)有利于深入、全面、详细地认识、归纳、总结传播问题、优势、经验等的细节、特征、多样性与复杂性,把握其产生背景、生成原因、方式路径,从而提出针对且可操作的策略(周进国等,2010),以积极预防、解决问题、推广普及、参考借鉴;2)任何共性都存在于个性之中,任何特殊性必然包含普遍性因素。因而在准确、客观把握概括的方式、结论、程度等基础上,围绕有关议题可从一或数个个案研究所得结果中,进一步提炼出概括性、理论性结论;3)个案研究并非孤立的,反而具有以微明宏、以点带面的独特优势,有益于从不同角度推进武术传播研究格局的完整与深入。简言之,强化武术传播个案研究具有如下作用,即对个案做出广泛且深入考察;为发展一般性理论提供依据;为以具体现象反思宏观问题奠定学理基础。在武术传播研究领域,虽然产出了个别拳种的传播考察研究,但在整体上其研究深度、广度有待加强。个案研究的生命力即在于纵向上的深度、横向上的广度和以个别例证一般的优势,扎实的个案研究对于构建和发展本土(即武术传播)理论具有重要价值与现实意义(陈涛,2011)。所以,强化武术传播个案研究要深入理解各种传播现象的生成、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向,广泛搜集微观与宏观资料用以互动和反思,合理融合相关理论解释传播实践,以此为基础最终上升到理论概括与实践总结,凸显具体理论价值与现实实践意义。

### 3.4 在着重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定量研究,以定性引导定量,以定量支撑定性,使研究的价值更高、内容更实

“十三五”时期,有学者基于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多元研究范式指出,感性的定性研究和理性的定量可优势互补,尤其对复杂的身体运动和民族体育,应该在感性认识之后进行理性认知(陈青,2016)。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更充分、客观的进行武术传播研究,充实、完善其科学化理

论体系,在着重定性研究基础上加强定量研究显得十分必要,而已积累起的定性研究传统、优势、成果、共识恰可为武术传播定量研究形成定性把握。如此前基于定性研究所形成的诸如武术传播与国家形象、文化“走出去”战略、文化软实力建设等热点议题和学术成果,通过定量研究的融入和支撑,不仅可使相关研究进一步走向纵深,也可使武术传播的效能呈现出更清晰、明朗的面貌。

从知识生产的目标角度而言,定性和定量研究侧重的是知识生产的不同方面,前者致力于新知识的发现,后者则更关注知识的验证(郑丹丹,2020)。由此,以定性引导定量,以定量支撑定性,更符合当下武术传播研究实际。1)围绕相关议题,定性研究在研究者知识储备和理论框架中,形成了一套包括理论、方法、观念、价值等在内的预设,进而通过搜集可以佐证既定预设的各类材料形成合理论据以验证该预设。在此过程中,结合定量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理论、论据、方法与研究问题、预设之间契合性,发挥严谨的逻辑推理在论证过程中的作用;2)武术传播事实与价值须臾不离,尤其后者普遍杂融着一些主观意见和经验,定量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价值中立,使之更为客观、本真地验证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所得出的一般性、普遍性结论,并据此为后续发展做出理性决策;3)武术传播现象是复杂的,定性研究在审慎地省思武术所身处或面对的国内外环境等各种客观因素基础上,提出宏大且思辨的对策,而定量研究则可为这种宏大且思辨的对策,落地到经验科学的具体策略提供可贵的技术支持(周英,2014)。除上述理论层面的推阐之外,武术传播中的诸多现实问题亟待借助定量研究予以落实。

作为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不论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一定有其弊端与不足。从武术传播研究实际出发,以“以定性引导定量,以定量支撑定性”为原则将之运用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对现阶段较为成熟的武术传播定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弥补和匡正作用,同时对提升研究价值与质量有所补益。

3.5 进一步强化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更多关注武术传播的域外实践及比较研究,在更大时空范围内透视武术传播诸问题

武术自产生便与传播紧密结合,不仅成就了其在时间上的“久”,也造就了其在空间上的“广”,书写了人们把握、认识武术传播生命的历史经验。无论在何种历史阶段,武术总是携载着“过去”走向“未来”。钱穆(2012)提出“应该从‘现时代中找问题’,应该在‘过去时代中找答案’。”这一论断启示武术传播研究需要进一步强化历史自觉,不仅为其当下传播服务,也为其未来传播留下可资借鉴的答案。另一方面,武术对国民身体和精神的塑造作用,使其成为“非尚武不足以立国”的社会尚武风尚的

重要构成。此外,武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互摄中,逐渐成为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与特质的典型符号载体。在“十三五”期间展开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中,武术依然被海外受访者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之一,彰显了其作为身体行为符号的文化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缘由与文化认知,才强调了“十四五”时期武术传播研究要进一步强化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

武术已成为2022年第四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为实现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出的“力争武术项目早日进入奥运会”的战略任务迈出了里程碑式的步伐。而从这一发展趋势而言,“十四五”期间武术传播的实证与比较研究,应获得与传播实践进程相符的进展,积极从宏观归纳概括走向微观深挖细究、从发展过程的描述与再现走向演进规律的提炼与总结,总体上应从如下方面着力:1)自觉地对武术在域外推广普及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或相关机构予以更多学术关注,基于传播现状深触到传播规律的系统性总结和理论性提炼;2)循序渐进地开展“走向田野”的武术跨文化实证研究,立足不同种族、地区、年龄、阶层等,以武术身体行为符号传播切入其本质与作用、内容与导向、对象与需求、评价与效果等方面,形成具有一定指导性、决策性的研究成果;3)与时俱进地深入到武术同国外其他文化类、艺术类、民俗类、体育类项目在传播理念、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平台、传播主题等方面的针对性比较研究,在有效地吸收外来之时,更好地透视和确认武术身体行为符号传播的独特之处。只有基于身临其境的深层解释和事实分析,才更有助于感知、诠释武术传播在不同时空范围中的问题;4)从武术身体行为的结构与功能充分阐发、发挥其普世性价值,并兼顾凸显其文化个性。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演进与格局,其本质是在不断融合发展中增进共识与价值认同,这决定了不同文明中均包含着可供全人类共同认知、可资全人类共享的文明要素。同时,不同文明中文化个性的自觉自信 and 共生共存,是维系世界文明多样性格局的经久动力。

#### 4 结语

武术传播作为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每一次进取无不实现于国家发展的大势之中。尤其自“十二五”至“十三五”的10年间,围绕武术传播各项各类议题所形成的诸多有益观点,在广泛的学术争鸣中得到持续深化,研究数量和研究深度均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良好态势。面向“十四五”时期,延续自身特点与优势,把握不足与经验,从研究站位、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研究质量、研究格局等各方面继续走向纵深是武术传播研究需要迈上的新台阶。



## 参考文献:

- 陈青,2008.动态的肢体符号:民族体育[J].体育文化导刊,(2):48-50.
- 陈青,2009.武术推广策略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8):151-154,158.
- 陈青,2010.民族体育跨文化融合[M].北京:民族出版社.
- 陈青,2016.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多元研究范式[J].体育学刊,23(4):25-29.
- 陈青,2018.习武人的身体创造[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44(6):50-55.
- 陈青,杜舒书,王增喜,等,2016a.国家意志下的民族体育文化延伸[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0(5):12-18.
- 陈青,张建华,常毅臣,等,2016b.民族体育的身体行为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0(4):83-88.
- 陈涛,2011.个案研究“代表性”的方法论考辨[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0(3):64-68.
- 陈威,2016.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视角下的淮海地域武术文化传承[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35(4):134-138.
- 陈卫星,2019.传播学叙事的历史学技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8(1):84-94.
- 陈新萌,赵光圣,郭发明,等,2018.竞技武术套路国际化发展历程、问题及对策[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30(2):166-169,192.
- 崔怀猛,苏健蛟,赵剑平,等,2018.中、韩高校武道专业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研究:以武术和跆拳道为例[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41(5):131-138.
- 戴国斌,2016a.新中国武术发展的集体记忆[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 戴国斌,2016b.中国武术传播三题:文化史视角[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0(3):56-61.
- 丁传伟,丁保玉,张长念,等,2016.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新路径:以孔子学院武术培训与研究基地创意平台建设为例[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8(3):231-234.
- 董川,陈玲,邵继萍,等,2019.国际化进程中武术文化自信建构的理论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3(3):69-75.
- 董刚,金玉柱,2019.从“走出去”到“走进来”: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的理念迭代与路径选择[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34(4):364-368.
- 段天龙,刘天宇,沈映制,等,2017.韩国跆拳道振兴计划对我国武术散打发展的启示[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33(4):32-36.
- 范铜钢,郭玉成,2016a.竞技武术散打技术标准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8(6):512-517,523.
- 范铜钢,郭玉成,2016b.武术散打与奥运会同类项目技术标准化水平比较:以拳击、摔跤、柔道、跆拳道项目为例[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0(3):62-67,86.
- 方国清,杨建营,2019.传统武术的信仰危机与文化重生[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3(7):71-76.
- 龚茂富,2018a.论当代民族复兴进程中“武术文化传统”的复兴与重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40(3):127-133.
- 龚茂富,2018b.美国“康村”武术的海外民族志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2(6):69-73,81.
- 郭发明,赵光圣,郭玉成,等,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武术对外交流及启示:基于武术家口述史的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2(5):72-78,86.
- 郭巍,梁徐静,2018.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中的数字化技术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38(4):96-99.
- 郭玉成,2016.中国武术文化研究述评[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42(1):40-45.
- 郭玉成,2019. 武术文化的历史传承与新时代发展[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3(6):50-58.
- 郭玉成,李守培,张震宇,等,2015.中国武术与国家形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郭玉成,王琨,王培含,等,2018a.吴彬先生访谈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41(4):116-122,130.
- 郭玉成,徐贵华,王琨,等,2018b.夏柏华教授访谈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41(4):138-145.
- 韩晓明,胡晓飞,2018.太极拳国际化推广问题及对策:以冰岛、挪威和喀麦隆三国孔子学院为例[J].体育文化导刊,(6):20-24.
- 侯胜川,2017.一个民间武术馆校的传播实践考察:一项口述史研究[J].体育与科学,38(4):71-77,85.
- 侯胜川,2020.拟剧理论视角下中国武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J].体育与科学,41(1):78-83.
- 胡凯,王燕,2017.武术的海外传播实证研究:以武术在美国孔子学院的传播为例[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33(5):36-39.
- 贾磊磊,2017.中国武侠电影的历史命名与类型演变[J].电影艺术,(5):3-8.
- 来向武,2013.危机传播的理论体系建构与研究展望[J].青年记者,(34):77-78.
- 李臣,张帆,2018.中国武术文化品牌化推进路径[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2(4):81-85.
- 李臣,赵连文,2017.互联网时代中国武术“走出去”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1(11):75-79.
- 李凡,2016.《师父》:现代性危机中的徐氏硬派武侠[J].当代电影,(1):38-40,97.
- 黎桂华,韩金清,李臣,等,2019.新时代中国武术发展的立场选择:回归“主体”[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3(8):62-68.
- 李牧,谭广鑫,2016.香港武侠电影的历史变迁及对武术传播的影响[J].体育学刊,23(1):36-40.
- 李守培,2016.中国传统武术伦理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
- 李守培,郭玉成,2016.中国武侠电影的武术传播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3):79-83.
- 李守培,郭玉成,2018.中医与武术标准化发展的比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2(3):60-66,102.
- 李守培,郭玉成,2019.中医与武术的标准化发展再比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3(5):91-98.
- 李艳君,岳庆利,2017.中国武术在意大利推广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9):58-62.
- 李义杰,2016.论武术文化传播的媒介逻辑与影像消费:基于功夫电影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7(9):169-173.
- 黎煜,2017.弱“武”“侠”变:近年来武侠功夫片的价值观嬗变[J].当代电影,(4):135-140.
- 刘宏亮,顾文清,王璇,等,2018.中国传统武术话语权危机与提升策略[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2(12):64-67.
- 刘韬光,郭玉成,2016.武术术语标准化命名研究[J].体育科学,36(10):26-31,79.
- 刘文武,朱娜娜,闫民,2016.对以往武术发展研究的反思:基于“文化工具论”的视角[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33(4):451-455.
- 刘毅,张佐堂,2018.网络文学中武术文化的译介与传播:以北美网络翻译平台“武侠世界”为例[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98-104.
- 卢敦基,马智慧,2020.文旅融合背景下金庸武侠地理学的价值与开

- 发策略[J].浙江学刊,(1):55-60.
- 卢晖临,李雪,2007.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118-130.
- 陆启威,2016.学科融合不是简单的跨学科教育[J].教学与管理,(32):22-23.
- 吕韶钧,2016.“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转型:以武术国际推广 3.0 时代为例[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39(4):46-49.
- 陆小黑,唐美彦,2016.中国武术侠义精神历史变迁的理论诠释[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35(5):132-138.
- 陆小黑,张道鑫,2018a.文化软实力视域下中国武术的特有价值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34(2):55-60.
- 陆小黑,朱大梅,2018b.“寻根溯源”:武术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正途[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41(2):139-144.
- 陆小黑,张道鑫,王洁,2020.“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武术“走出去”的时代解读与策略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35(2):227-233,248.
- 吕旭涛,孟田,2016.文化地理学视野下杨式太极拳传播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0(7):62-67.
- 马明达,2007.说剑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
- 马秀杰,高瞻,Paul Bowman,等,2020.传播与变迁:太极拳在英国的发展历程与传播动力[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4(3):55-64.
- 马秀杰,姜传银,Paul Bowman,2018.李小龙的文化遗产:第四届国际武术论坛(英国卡迪夫大学)学术综述[J].体育与科学,39(5):13-18.
- 满现维,王岗,2016.中国武术发展的文化选择:多元回归[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8(2):128-132,141.
- 欧阳宏生,朱婧雯,2015.论认知传播学科的学理建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37(2):34-40.
- 潘冬,岳文言,2016.基于文化学视角的中日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转型的比较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42(4):46-50,55.
- 钱穆,2012.中国历史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
- 孙超,2017.大数据环境下武术的国际化传播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10):22-24,86.
- 孙刚,殷优娜,2017.跨文化教育:中国武术国际化发展的新视域[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1(5):62-67.
- 孙刚,殷优娜,李源,2018.“第三空间”理论视域下中国武术的跨文化交际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41(6):125-131.
- 孙科,郇昌店,任慧涛,等,2020.危机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中国体育叙事[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4(5):1-15.
- 唐韶军,王美娟,赵翠荣,等,2018.论蔡龙云“击舞融合”武术思想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34(6):56-59.
- 王东旭,答邦俊,2016.假晶现象视野下中国武术的原形文化与新形文化[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8(6):518-523.
- 王建伟,2017.文化安全视野下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化传播[J].体育学刊,24(1):32-36.
- 王明建,陶朔秀,2017.中国武侠电影的技击之道:基于中华武术与西方武技的比较分析[J].电影艺术,(5):14-20.
- 王宇新,高亮,2017.日本“武技”国际化传播的经验及启示[J].体育文化导刊,(12):32-36.
- 温博,焦艳菊,2018.论传统武术文化对外传播的三个支点[J].体育文化导刊,(6):6-9,35.
- 吴文峰,薛红卫,张晓丹,等,2017.中国武术在美国传播现状解读[J].体育文化导刊,(3):16-20,39.
- 肖留根,2017.武术传播的理念困境与“借势”体系构建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33(1):34-38.
- 徐卫伟,李士英,殷泽锋,等,2018.武术在克罗地亚的发展、问题与路径选择[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41(3):139-145.
- 阎彬,2018.相扑仪式化传承及对武术的启示[J].体育文化导刊,(8):153-157.
- 杨建营,2018.对接“国之大事”的武术发展战略调整[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2(6):51-56,63.
- 杨少雄,谢群喜,2016.“互联网+”背景下武术消费市场拓展策略[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70-76.
- 杨素香,2017.太极拳在美国的传播:一项基于美国大众媒体语料库的研究[J].体育科学,37(3):68-78.
- 阴晓林,赵光圣,郭玉成,等,2018.张山先生访谈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41(4):123-130.
- 袁和平,陈骁,侯弋,2016.武侠片需要侠义精神:《卧虎藏龙:青冥宝剑》导演访谈[J].当代电影,(3):55-58.
- 张国良,2019.再论传播学的学科特性[J].江淮论坛,(5):131-135.
- 张路平,郭发明,赵光圣,等,2018.门惠丰教授访谈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41(4):131-137.
- 张银行,2018.海峡两岸武术交流史论:认同的视角[J].中国体育科技,54(1):138-145.
- 张银行,李吉远,李成银,2013.关于“后奥运”武术普及与推广的若干思考:基于国内的视域[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30(1):87-92.
- 张银行,刘轶,杜舒书,等,2019.明清思想与中国武术发展及启示研究:基于“向实”的线索[J].体育科学,39(11):26-39.
- 张震,苑城睿,张旭琳,2020.武术与城市:中国古代武术繁荣的一项城市史考察[J].中国体育科技,56(4):69-76.
- 郑丹丹,2020.想象力与确定性:个案与定量研究的关系辨析[J].求索,(1):172-180.
- 郑旭旭,袁镇澜,2011.从术至道:近现代武术发展的轨迹[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周进国,黄彦军,2010.个案研究:体育社会问题的一个研究方法[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7(2):133-136.
- 周庆杰,2016.中国武术在来华留学生中传播的创新模式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7):69-73.
- 周莎,2016.《危城》: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缩影[J].电影评介,(21):35-37.
- 周维方,2019.“中国梦”视域下传统武术责任担当的路径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36(6):712-717.
- 周维方,赵光圣,2018.“中国梦”视域下传统武术社会价值观照:基于武术家群体的口述史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41(6):132-139.
- 周英,2014.少数民族经济学定性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及后现代机遇[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3):111-117.

(收稿日期:2020-04-30; 修订日期:2020-08-17; 编辑:尹航)